



在红色政权内部实施恐怖破坏与刺杀。能否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成了苏维埃政权存亡的关键。

1917年12月20日，被誉为“革命的剑与盾”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诞生，主席捷尔任斯基指示，“凡是身份已确认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抢劫犯和贪污犯，一经捕获，立即就地枪决”。1918年7月30日，列宁遭社会革命党女刺客卡普兰暗杀，正值协约国全面开始军事干涉，年轻的俄共（布）中央委员布哈林发出：“如果法治行不通，就让枪炮说话！”“红色雅各宾时代”开始了。

列宁遇刺后的几个月里，仅在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就有800名阶级敌人被处决，整个“红色雅各宾时代”处决的反革命分子超过3万人。但苏俄领导人绝非“第二个斯托雷平”，而是出于一种必要，“如同生死搏斗中，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拳头是必要的，哪一个不必要”。同时，身为“革命的剑与盾”，契卡也以铁的纪律整肃队伍，树立威望，有一天，疲惫的捷尔任斯基去探望姐姐，姐姐体恤弟弟，专门烤了白面包，但捷尔任斯基听说面粉是从黑市买来时，顺手把餐盘掷出窗外，这也是“铁人”这个绰号的来历——既雷厉风行，又品德高洁。

随着1922年内战基本结束，苏俄（年底改称苏联）的中心工作转向快速工业化。特别是1928年到1938年实施的两个五年计划里，国家主要用农业集体化和工农业剪刀差，把农业的利润转移到工业中，以及向外国出口粮食换取外汇。毫不夸张地说，苏联用来发展工业的

资金，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富农阶级反抗以及白卫分子恐怖刺杀又有沉渣泛起之势。为将反恐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1934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处理关于策划或犯有恐怖行动的案件的程序”的决议，对各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的修改，确定在侦查和审理破坏行为和恐怖行动案件方面的特别制度，以及在有关方面缺席的情况下开庭审理案件等等。鉴于对这类案件的特殊审理方法，在很多情况下导致审讯过程中对法制和被告权利的破坏，新决议将特殊审理方法予以取消，恢复了对上述案件侦查和审理的正常程序。当然，由于1937至1939年苏联国内发生“大肃反”运动，相关反恐法律条文的落实情况并不令人满意。

打赢“战后之战”

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苏联由于同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一度没卷入战争。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德国法西斯眼里的“劲敌”，向苏联“输出恐怖毒素”是既定方针，着力点就在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在1920年苏波战争后落入波兰手中，那里有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OUN），领导人班杰拉得到德国幕后支持。1939年9月，波兰被德苏分区占领，希特勒故意让苏联占领西乌克兰，以便OUN在苏联境内形成“第五纵队”。纳粹间谍建议OUN不要过早暴露实力，要等待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时机。在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同样

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方向的亲德分子趁机作乱，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1944年，纳粹德军眼见东线大势已去，为了维持战争潜力，希特勒加紧向各种反苏武装示好，包括将班杰拉分子改组为“乌克兰起义军”（UPA），资助武器给立陶宛的“丛林兄弟”游击队。这些匪帮经常实施屠村，为了向同伙“传授经验”，匪帮“督战官”还将虐待平民的办法整理记录下来，包括将刺刀钉入太阳穴，用匕首将嘴角撕到两个耳根，用园艺刀将女性前胸割开……为了征剿幽灵一般的法西斯匪帮，苏联军队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像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妻兄安东就因为身份暴露而被班杰拉恐怖分子折磨致死。

1945年5月9日，德国投降，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等地的反苏匪帮又与英美情报机关拉上关系，以小股兵力游击作战。斯大林指派平叛反恐名将索科洛夫（后成为苏联元帅）负责指挥，他一方面在叛乱区建立基层政权，提供工作机会，一方面加大情报工作，全力策反被俘恐怖分子，成为潜伏在匪帮内部的“定时炸弹”。经过近十年的“战后之战”，苏联彻底荡平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恐怖匪帮，共有12万名恐怖分子被消灭。

从那以后，苏联国内出现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随着经济恢复和发展，尤其计划经济下的跨区域大协作，使得国内各地联系远比沙俄时期紧密得多，加上苏联调整斯大林时期一些过火的民族政策，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投资扶持，社会矛盾

平心而论，鉴于国家所处的复杂社会环境，**俄政府并不相信反恐行动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讲方法，重策略”。**